

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路向和意义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对象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理论，一般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1885 年，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巨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①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同时谈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强调对它们的运用必须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结合起来。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没有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作进一步说明，但当我们读了恩格斯写于 1883 年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时，我们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会有初步的认识。恩格斯指出：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

^①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4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74 页。

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①

由上文可知，恩格斯讲话的第一段，概括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第二段概括了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学说。这就是说，前者指唯物史观，后者指剩余价值学说。以恩格斯这篇讲话和恩格斯两年后致查苏利奇的信比较对读，就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核心即剩余价值学说，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由此，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对象就是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规律。

我们从列宁关于“以往的”历史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之不同性质的评论中，可以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对象的本质及真谛所在。列宁十分明确地评论道：

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②

列宁指出的这两点区别，不仅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以往历史理论的界限，而且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对象的核心所在。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602页。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页。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普遍性和原则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旨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普遍性品格。但是，当人们运用这一理论探讨、说明相关问题并结合社会实践时则必须坚持它固有的原则，即将其与一定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作用。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普遍性和原则性辩证结合的统一体。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固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为对象，而人类历史始终是变动的、发展的，故这一理论也是变动的、发展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之普遍性与原则性的辩证统一，以及它的变动的和发展的存在形式，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实践上，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①此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也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9世纪各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作出判断而得出的结论。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根据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思想，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③此后不久，列宁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④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和列宁根据这一理论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

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页。

③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10日〔23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4页。

④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卷，第722页。

者。于是，有一种观点是模仿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以革命的力量攻打大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取得革命的成功。但是，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取得革命的成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方针、策略，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新的条件。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无论革命还是建设，要实现既定的目标，有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这个目标是否符合当时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

三、新时代历史理论面临诸多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

当前，我们国家已进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理论面临方方面面的新问题，有些问题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意义，如：

第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 14 亿中国各族人民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这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经过近些年的热烈讨论，我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觉醒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的。总体来看，这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国是，受到各族人民的关注和重视。

第二，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人民大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可视为“人民之问”。因其承载的体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也受到国外的广泛关注。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问题也可视为“世界之问”。经过反复学习、研讨，我们认识到，自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总结出来的这条“中国式现代化”

的道路，既包含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两个文明”“人与自然”“和平发展”等关键词，充分表明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年表上，2020—2035、2035 年到 21 世纪中叶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前者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者是“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前景！自 1840 年至 2050 年，中华民族从历经劫难、矢志不渝的抗争到走向伟大复兴的锦绣前程将经历 210 个年头，而自 1921 年以来的一个又一个胜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这是彪炳于中华民族光辉史册上的灿烂华章。

第三，文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这是我们在今后许多年都不能忘记并要作出积极回应的一个重大问题。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繁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一方面继续发展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化对物质文明的推动作用，以收两个文明相互促进之效。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不断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近代革命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发展，把它们推向新的高度。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精神力量的源泉。这种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将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走向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全过程，这个过程也必将使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变得更加坚固、美丽。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使“以文化人”的优良传统达到新的阶段，因而也是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空前提高的过程。中华民族不仅可以从容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还将以自身深厚的综合素养对世界作出新的更伟大的贡献。

第四，世界历史走向和人类前途命运之问。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的野蛮时期，也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时期，但多是在蒙昧时代和动乱时代度过的，尤其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无数家庭家破人亡。直至今日，世界上一些地区的战乱和贫困仍在继续，人民生活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各国人民和政治家们面对人类命运不同道路的选择时，理应作出明确的、理性的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①

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经历了百万年人类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自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1840—1949）的百余年中，中国人民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留下了至今痛苦的记忆。从历史的教训中，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打败外国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使民族得以独立、人民获得解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的光辉前景。不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人民选择这条路走下去，是坚定的、毫无疑义的。同时，中国人民热切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和他们的政治家们，审时度势、坚定地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道路，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开创美好的未来。

新时代历史理论面临的重大问题还有很多，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自己的专长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也还有很多，这是时代的任务，也是历史的责任。

四、在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中充分发挥“学术己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历史理论研究面临许多新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有关历史发展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亟待研究并作出回应。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9—50 页。

这就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提高认识，扎实工作，符合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新形势。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发出这样的号召：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①

这里说到的几个“之问”和“之路”“之治”“之理”，显然都是事关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号召，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信任和期待：在新时代如何充分发挥学者的聪明才智及专业所长，为推进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作出新贡献。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在认识上、学术上、理论上进一步提高自己，把“学术己任”置于中心位置看待。

史学工作在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对问题的分析、研究，应在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视野下展开。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史学遗产中的优秀成果，了解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熟悉中国古代史家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提高把握所论问题的针对性和准确性。第二，要在“两个结合”上下功夫，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下功夫，这是指导我们研究问题、论述问题的方法论，应贯穿在整个研究工作中。第三，从前人的研究与论述中获得启示和借鉴，提高自己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中国史学讲求经世致用和会通古今，这是一代代史学家治史经验汇聚起来的成果。唐代史学家杜佑著《通典》，记上古至唐德宗贞元年间事；宋代史学家郑樵作《通志》，记事起于上古下至于唐；元代史学家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记事上起于上古、下至于南宋嘉定之年。前述三书号称“三通”，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撰述的三座里程碑。杜佑力倡经世致用之学，申言：“所

^①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①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较早提出以史经世的主张，对后世影响极大，《通典》全书力主贯通之旨。郑樵则强调“会通”的重要，他在《通志·总序》中开宗明义写道：“百川异趣，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道大矣哉！”^② 他以自然的“会通”比喻社会的“会通”虽不甚恰当，但反映在民族思想上则是积极的倾向。马端临更看重历史的变化，他认为《通典》分为九门（类别）的做法已不符合他所在的时代，故将九门扩大为二十四考，如《通典·食货典》一门就扩大为八考，反映了马端临变通的思想。从贯通、会通到变通都反映出贯通古今、经世致用的宗旨，显示出宏大的历史视野和作史之志。古代史家能够对历史提出真知灼见，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史家不论在研究史学还是考察历史上，都具有胸有全局、举重明轻的器识。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史通·叙事》篇中称赞学人具有“举重明轻”的见解和能力，^③ 这种胸中既有全局又有轻重缓急的功夫是作史者至为重要的识见和能力。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王夫之认真研读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后，在《读通鉴论·叙论四》中概括《资治通鉴》内容时写道：“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④ 在王夫之看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写出了重大史事即国是、民情、边防，也写出了常见的史事即一般人入仕、治学、做人的原则，这也可以看作是观察社会历史中全局观念和轻重有别的见解。

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展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学术影响力，借鉴以往史学家在相关问题上研究、论述的器识，推动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这对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都有重要意义。

① 杜佑：《通典》卷1，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

② 郑樵：《通志·总序》，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

③ 刘知幾：《史通》卷6《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6页。